

哲学文选

1984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ZHE
XUE
WEN
XUAN

前 言

这本《哲学文选》是我所同志1984年撰写的、尚未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我们把它们收集成册，用以从一个方面反映我所同志们一年来微薄的劳绩，并和兄弟单位交流，以期得到批评指正。

由于我们水平很低，我们的文章在对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传统课题或前沿课题的阐发上，新意都是不多的；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上，也是不够的。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的现实，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的新的科学理论和迅速发展的技术革命，都给哲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急待解决的课题。所以，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真正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哲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卢广森(1)
略谈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	刘 勇(9)
略论建国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李 茂(21)
现代化建设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田伯泰(51)
论世界和世界观	刘性凤(61)
关于经济改革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若干问题	杨丙安(70)
有关生育活动的几个道德问题	秦树理(90)
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人是目的”的原则	吴潜涛(106)
试论无产阶级的荣誉观	王昕杰 乔法容(124)
试论蔡元培美学美育思想的哲学社会基础	何 华(139)
胡瑗哲学思想初探	卢连章(157)
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及其产生的背景	崔大华(175)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块瑰宝	李寒林(183)
论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杨君游(196)

哲学研究工作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卢 广 森

理论研究工作要为现实服务，这是我党一贯的方针，1983年6月，在纪念《红旗》创刊25周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光辉题词。这不仅对整个理论工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哲学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只有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开创哲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推动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一)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一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着，今后还将继续为人们所称赞。它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活力，主要是因为它概括地反映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即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例如，在古代奴隶社会里，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高峰，那是由于古希腊和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和科学在当时有最高的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封建社会有长时期的、成熟的发展，所以就产生了丰富的封建文化和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水平很高的哲学思想，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出现了文化和哲学的复兴浪潮，那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一

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是工人阶级兴起和资产阶级衰败的标志，是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哲学兴起的象征。这一切都说明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我们正在从事着前人没有经历过的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事业。在这样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把我们带入了生产自动化和管理自动化的时期。由于我国的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落后，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所以我们更要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技术革命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和技术水平出发，制定我们的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列宁曾经说过，已经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6页）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变资本主义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我国正在努力这样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我国长远决策。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总路线、总任务，一系列的改革工作已着手进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这场伟大的改革，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引起人们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国际范围内不断兴起的新的科学理论和迅猛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也在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想习惯，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急待解决的课题。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现代科学、现代文明的高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思想相结合，对当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向作出深刻的分析，科学地回答现实向我们提出的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对于一个忠诚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崇高的、具有吸引力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哲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的现实做出了重大贡献。最明显的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重申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我们的广大哲学工作者，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听取时代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写出有时代特点的哲学论著，用以增进人们对人类将来的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理解和认识，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活动提供哲学理论上的参考，从而真正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在哲学研究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个问题

上，有些同志还有顾虑，思想不通，主要表现是：

一曰“没有学术价值。”即认为研究现实问题的哲学论文或专著，都是“时事政策”，没有学术价值。这是妨碍我们哲学研究工作和现实结合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认为，所谓学术价值也首先应该包括并表现为有没有应用价值。凡是填补了哲学上的某一空白，发展了某一理论，提出了某一新的见解等等，都应看作是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原理，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使人们的认识有所提高，在行动上有所遵循。实际上就是人们应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体现。应用也是一种普及工作。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1937年，毛泽东同志给哲学家艾思奇同志写信，表扬他的《哲学与生活》的著作写得好。1951年3月17日又给哲学家李达同志写信，认为他的《〈实践论〉解说》一书写的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迫切需要的，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逐步推广辩证法和哲学的解放问题。这些都对哲学的普及和推广起了极好的作用。

我们评价一篇哲学论文或一部专著是否有学术价值，不是以主观愿望为标准，而是以客观实践为标准。毛泽东同志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61页）这都告诉我们，应当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评论哲学论著的价值高低。看

一篇论文水平的高低，就是要看它为人类、为社会贡献了什么，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有利于改革，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把研究现实的哲学论著当作“时事政策”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除了他们不重视实践问题研究以外，也是一种糊涂的认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历来认为只有研究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才是发展哲学的重要途径。我们的导师历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研究19世纪上半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情况和工人运动，就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列宁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现实结合起来，就不能在地球上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现实。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若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寻找不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切都说明一个真理，即“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的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恩全集》第27卷第433页）那种自表清高，不研究现实问题的人，只会高喊漂亮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二曰“易犯错误”。我们认为哲学研究工作犯不犯错误，不在于是否研究了现实中的问题。努力研究现实中哲学问题的人，不一定会犯错误；那些不研究现实中哲学问题的人，也不见得不会犯错误。作为一个哲学研究工作不研究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一个人犯不犯错误，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如果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仅

不会犯错误，而且还会取得胜利。如果“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163页），就会犯错误。我们写出的论文或专著，如果没有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会出现错误；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一般说来是正确的。

我们承认在意识形态这个战线上是容易犯错误的。因为现实的问题在发展之中，事物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不易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质；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一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规矩可循，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在理论上要有胆识和勇气，有不怕风险的决心和气魄，要面向现实、敢于提出和解答现实中的问题，才能在理论上有所进展，从而推动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三曰“不务正业”这是反对研究现实中哲学问题的又一个借口。一个人从事的事业是正或是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标准。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叫做“正”，把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而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行为叫做“偏”或“斜”；在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把符合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行为视为正，而把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行为视为偏和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我们的上层建筑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我们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研究工作，自然要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凡是符合这个方向的就是

正业，反之，就是不务正业。脱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寻求什么“正业”的人，必然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轨道，走上错误的道路。

(三)

怎样才能坚持哲学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呢？

首先，应当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对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理论的说明，这是哲学研究工作者和整个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共同任务。例如，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总结出象中国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那样的经验，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中有规律可循，还需要若干年的实践才可以总结出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于经济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改革等等，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去研究，去总结；又如，我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获得了成功的经验；目前，正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革，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这场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尚待我们从现实的研究中去发现；再次，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去制定正确

的战略方针，以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我们的重要课题。还有新时期的领导工作如何科学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甚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这些现实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哲学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有社会主义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努力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结成联盟，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就要认真贯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针。马克思曾说过，对于学术性的刊物，“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为目的方针。解放以后，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方针。建国以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影响，在学术领域内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有时甚至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混淆起来，把学术问题当政治问题处理，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许多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挫伤了很多人的理论工作积极性。在总结这些教训时，许多地方又补充了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和不装档案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政治生活稳定，学术探讨和学术讨论的空气也是正常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是允许的，但这种争论是为了求得真理，而不是为了打倒某个人。目前尽管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也不要怕，在今后实践中会使他们逐渐放弃那些不必要的顾虑。

最后，还应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哲学的专门研究单位，

谈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

刘 勇

我们曾经说过，马克思在理论分析的某些方面，创立和运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见拙作：《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那么，马克思究竟在理论分析哪些方面运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呢？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有何具体的特点？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乃是哲学、经济理论工作者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而且有着巨大的现实方法论意义。本文不可能全面论及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只想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某些理论分析，拟就上述问题略谈一、二。

—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一切社会生产过程一样，首先表现
~~~~~  
应把研究现实中的哲学问题列入科研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进行必要的监督，以促进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那些在学术领域中研究现实问题有贡献的同志，应当优先晋升他们的职称，对那些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优秀论著，应当予以奖励。这样坚持数年之后，研究现实问题就会蔚然成风。那种认为研究现实问题“没有学术价值”，“不务正业”等种种疑云也会自然消除。这样就会使更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使哲学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中，获得更大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物质的劳动过程，表现为一个“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劳动过程在人类不同的社会形式下，总有一些简单的基本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且这些要素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物质相互关系。从事物结构（“结构”即事物内部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方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概念同现代科学结构概念本质上则是一致的。）的角度看，马克思所制定的“劳动过程”概念，已经从实质上包含了物质结构的思想。确切地说，任何社会生产的劳动过程都是具有一定结构的客体。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形式下，无论是在欧洲原始的共同体部落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还是在亚细亚、斯拉夫以及东方古老的封建帝国之中，各种劳动过程千姿百态、独具特色，然而就其结构来说，它们则更多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所有上述劳动过程之中，直接的活劳动则起着主导的作用，并不断以自身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新的灵魂，从而缔造了埃及的文明和古老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直接活劳动称之为以往社会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其次，劳动资料在这里通常表现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中间环节。因为这些简单的劳动资料（从太古时代的石制工具到近代精制的人工脚踏纺车）无一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最后说到劳动对象，它同劳动

资料一样在劳动过程中隶属于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其效益的发挥紧紧取决于生产者的直接劳动。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劳动过程都采取了一种以直接的活劳动凌驾、支配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轴心关系的结构形式。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结构是以往劳动过程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又不同于以往一切社会劳动过程的结构。仅就其结构的组成要素来看，则是以往任何劳动过程不可比拟的。例如，从前科学“有限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使其成为劳动过程的独立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呼风唤雨之力，迫使自然力（风、水、蒸气、电）、协作力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9页）所有这些要素同原有要素融为一体，以其具体的历史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错综复杂的特点。

然而，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三个本质的特点。第一、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中，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直接的活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和决定的要素。“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9页），反之，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的“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的关系，“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

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注：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9页。第二，随着劳动资料逐渐采取了自动机器的形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部发生了一种深刻而且有趣的变化，作为机器的劳动资料“不象从前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相反，劳动者的活动现在表现为：“它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8页，着重号为本人加）第三，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科学、自然力诸要素物化在劳动资料的机器体系中，并同庞大的机器体系一道在活劳动面前行使“主人的权力”。这里，如果说直接的活劳动在质的方面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在量的方面却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它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2页，着重号为本人加）可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以体现在劳动资料中的物化劳动支配、奴役活劳动的关系，作为自身结构的轴心关系，从而显示了人类物质劳动过程的又一特殊结构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包括以往一切社会的劳动过程）时，首先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结构加以把握的。他不仅详尽分析了上述结构的组成要素，同时还深入探讨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式鲜明体现了科学的结构分析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当代形形色色的结构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

对事物作结构分析时，总是力图在复杂的结构网络中找出其轴心的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以前劳动过程结构的轴心关系表现为直接活劳动对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支配，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中，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还广泛运用于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例如，他把土地所有制关系确定为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轴心关系，把资本的关系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轴心关系。总之，这种结构分析方法的特殊意义在于，借助结构轴心关系的划分，认识便于区分、把握不同事物的纵横复杂的结构形式。

人类社会的物质劳动过程被看作一定结构的客体，马克思的这种立场对于认识不同社会劳动过程质的特点，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既然各种劳动过程基于不同的结构形式，赋予自身千姿百态的历史特征，从而显示了它们之间质的差异。既然事物的性质主要决定于该事物结构关系的演变，那么，科学分析可以通过对事物的结构剖析，进而正确理解事物质的特点。正如在化学实践中，弄清分子中原子的不同排列结构，对于认识分子化合物的质的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方面看，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解各种不同劳动过程本质的一把钥匙。

## 二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劳动过程，而且也是价值增殖的过程。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劳动、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等要素不再以物质实体形式出现了。用马克思的说法，现在它们表现为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即劳动的价值（工资）、劳动工具的价值和原料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4页,看重号为引者加),并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如果从这种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质诸要素的结构关系似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各价值要素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称做为“资本的形式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0页,看重号引者加)(注:在辩证哲学中,形式这个概念的含意不是指外在形式,而是指内部结构),以此同“资本的物质关系”加以区别。从事物结构认识的角度看,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一个新的结构,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构。

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构不象劳动过程结构那样,是一切社会生产过程共有的永恒结构。相反,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有的结构。因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物质诸要素以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的形式出现,并彼此发生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中,例如,“在纯粹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生产的农业中……决没有完全包括原料和劳动工具借以表现为资本本身要素的那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57页(“·”号为引者加)在这种意义上,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构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特征。

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构也不象劳动过程的结构那样,直接而又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相反,它隐藏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仿佛是一个主观抽象的、人们随意杜撰的结构。恰恰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表现得如此困惑不解。他们或者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这种结构,或者干脆把这种结构关系“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